

中国 理论语言学的 文化重建

申小龙 张学文 唐厚广 著

ZHONGGUO
LILUN YUYANXUE DE
WENHUA CHONGJIAN

沈阳出版社

中国 理论语言学的 文化重建

中国语言理论重建

ZHONGGUO
LILUN YUYANXUE DE
WENHUA CHONGJIAN

沈家煊 著

中国 理论语言学的 文化重建

申小龙 张学文 唐厚广 著

ZHONGGUO
LILUN YUYANXUE DE
WENHUA CHONGJIAN

沈阳出版社

· 沈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理论语言学的文化重建/申小龙, 张学文, 唐厚广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6.7

ISBN 7-5441-3142-4

I. 中… II. ①申…②张…③唐… III. 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5080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5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葛 君 杨敏诚 孙家骥

责任校对: 钟 仁

封面设计: 达 达

装帧设计: 李 锋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42.00 元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理论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成长的。在它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的语言理论无论在范畴、体系还是方法上都有了崭新的面貌。历次语言理论问题的讨论也取得了有益的收获。西方的语言理论与方法为中国的语言理论注入了现代科学的精神与知识，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无可避免地给中国理论语言学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其中主要的就是在对汉语的文化特征、中国的语文传统和语言研究的人文科学方法的认识上走入了极大的理论误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对这一系列失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引起了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而深入的理论争鸣。这一场世纪末的学术论争是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走向新世纪的阵痛与变革，它预示着中国理论语言学学术新规范的诞生。

当代意义上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将充分关注语言理论的文化视界。语言理论的文化视界首先在于树立一种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人与世界联系的根本纽带。对各民族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都离不开这样一种文化视界。当代中国语言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都将在文化的视界中作出新的阐述。

当代意义上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将重新阐释人类语言理论的人文主义传统。人类语言理论存在三大人文主义传统，其一是中国语言人文主义传统，它的特点是经学的阐释；其二是欧洲语言人文主义传统，它的特点是哲学的思辨；其三是美洲语言人文主义传统，它的特点是人类学的实践。在当代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语言人文主义传统将在语言与文化，尤其是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当代意义上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将在反思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局限的基础上，重建人文科学方法论。其中包括功能主义的方法、传统阐释的方法、文化通观的方法。这些方法将引导语言理论充分关注语言事实，充分体悟语文

精神，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作为人文科学的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在积极引进吸收国外语言理论和科学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基础上，将积极参与建立民族语言理论体系，努力开拓语言理论的人文科学视界，与人文科学研究广泛对话，与人类语言理论广泛对话，为人类的语言学事业做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Theoretic Linguistics took shape under the criterion of the western linguistics theory. During its development that laste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Chinese linguistics theory has got a new look not only on its categories and system but also on its methods. Every discussion about it has also gained much. It's surely appreciated that the western linguistics and its method have poured the spirits and knowledge of modern science into Chinese linguistic theory. However, becaus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languages, as well as their culture tradition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the criterion of the western linguistic theory inevitably has many negative impact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theory. The main one is that many theories, which a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philology tradition and the humanistic method of language research, went wrong. The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 rising in 1980's, deeply reflected this series of mistakes and aroused a theory contention that was so broad and profound that no 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eoretic Linguistics could compare with.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whe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etic Linguistics strode to a new age, this academic contention, a throes and transform, arouse and indicated the born of a new criterion of Chinese Theoretic Linguistic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etic Linguistics will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view of linguistic theory. This cultural view will first build up a humanistic language sense. Language is, in nature, a kind of cultural phenomenon. It is the way of how a nation looks into the world and the basic link between human and the world. To get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any language's nature, function, structure and developing rules, this kind of cultural view is inseparable. A series of basic theory problems in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will be newly expounded in this cultural view.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etic Linguistics will elucidate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linguistic theory. These are three such ones. The first one i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trait of which is hermeneutic. The second one is in European linguistics, the trait of which is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The last one is in American linguistics, and its trait is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 Under a new history condition, these humanistic traditions will re-shine in the research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especially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etic Linguistics, the foundation of which is reflecting the limits of natural science methodology, will rebuild humanism methodology. This methodology includes the functionalism metho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expounding, and the method of overview all cultures. All these methods will lead linguistic theory to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language facts and fully inspect language spirits so that it will be more scientific and have a more powerful expounding abilit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etic Linguistics, as humanism, will continue absorbing actively the foreign linguistics theory and expounding scientifically the Chinese linguistic tradition. On the groundwork of that, it will positively attach itself to building a national linguistic theoretic system, work hard to expand humanistic view of linguistic theory, and broadly interchange with humanistic research and linguistic theories, so as to contribute Chinese people's distinction to the enterprise of human linguistics.

(陈洁译)

前言：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文化变革

申小龙

站在世纪之交，回顾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可以将它清晰地划为传统和现代两种范式。传统的理论语言学，贯注着浓郁的语言文化整体观照的人文主义精神，举凡语言的性质与功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社会、语言研究的方法，都同文化问题、人文科学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人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平面对立的关系，而是全方位的关系。作为这种全方位关系的体现和维系，语言也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符号系统或工具。“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文”与“道”一体。古代语言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更明确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所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国传统的语言理论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思路”或者说文化通观下进行语言理论问题的探讨的。

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成其规模的。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为中国学者展示了一个与传统的范式截然不同的以分析见长的科学理论系统。学者们纷纷引为楷模。以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为例。该书第一篇论述语言学的意义、目的、方法，语言的性质及其和人类社会种种活动的关系；第二篇论述语言的构成及其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基础；第三篇论述语言的组织和分类，包括形态学和句法学；第四篇论述语言的起源、演变、分化与融合。这样一个框架几乎奠定了本世纪理论语言学的基础，而其来源，正如张世禄所示：“大部分根据于 L. Bloomfield 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在发展中因描写主义和材料至上主义的压抑而步履艰难。尽管如此，理论的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止。一方面是在汉语的具体研究领域不断滋生着理论思辩，尤其是在汉语语法问题上的几次讨论进入了较高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是一些纯理论的问题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例如语言和言语问题；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问题；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

语言计划和语言融合的问题。除此之外，西方语言学重要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中国现代理论语言学史上形成一个又一个引进、研究的热潮。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80 年代的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90 年代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等。如果没有反思，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将把它的研究范式延续到下一个世纪。这个范式的特点就是系统地引进西学，在不断的引进中求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化语言学在我国异军突起，其激烈而深刻的理论批判与理论思辩迅速激宕为一股波及全国乃至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思潮，强烈地震撼了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深刻反思了 20 世纪初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研究的规范和影响，深刻反思了汉语的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反思了中国语文传统的文化特征及其现代意义，深刻反思了人类思想史上语言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从而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从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解放出来，建立汉民族的语言理论体系，为丰富人类语言理论作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文化语言学的一系列著作，如《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辩录》（学林出版社，1989）、《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汉语人文精神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上海三联书店，1990）、《语言的文化阐释》（知识出版社，1992）、《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语文的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意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文化语言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新文化古代汉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文化语言学论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汉字人文精神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等等，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代课题。

文化语言学吸收了西方语言人文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但它形成于世纪末汉语研究许多基本领域的危机与反思，在我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族语言理论的目标，并且深入、系统地揭示了中西文化、语言和语文传统的深刻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语言学是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在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首次建立的本民族独立的语言理论学科。不仅如此，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文化语言学，以其深刻的理论反思，还提出了一个“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新概念。所谓“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其涵义与现代中

国理论语言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深刻差异：

其一，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积极参与建立民族语言理论体系。所谓“民族语言理论体系”，建立在两个理论支点上。一是对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的深刻理解，一是对本民族语文传统的深刻理解。

科学认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对于深受西方语言理论影响和制约的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由于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汉语文化特征的认识必然要突破现有的所谓“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原则与框架。拿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来说，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即认为只有口语是反映概念、思想的，而文字只记录口语，与思维没有直接联系。因而最先进的文字是作为口语化身的忠实记录口语语音的文字。拿这一条“原理”来规范汉字，那么汉字的表意形式就是一种落后的形式，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然而从文化的特点看，汉族人在哲学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在艺术上重意合不重形合，在语言上以“非形态”的面貌出现。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和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正是基于汉语语言思维这种特点，所以汉字构形以表意为首要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词语的确定信息，方块汉字的平面性储存的信息显然优于线性文字。而从语言的特点来看，印欧语依靠变音来表达语法语义，其词形以发达的辅音和元音自由接缀，各音素之间界限分明，音节结构复杂，词的信息是由各个音素共同来承担的。而汉语不依赖变音来构词、转化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汉民族音感中的基本语音单位不是音素，而是音节的声韵结构，词的信息靠音节的声韵结构和附于整个音节的声调来承担，汉字就不必分析到音素。而且汉语中大量的同音词的存在造成词的语音形态信息含量锐减，这在书面语中只能依靠文字图像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来补偿。事实上，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局限。文字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像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字形和字义的统一。因此，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像性越强的文字，突破时空局限的能力就越大，与思维的联系也就越紧密。由此看来，拼音文字并非世界文字体制中最优秀的，更不是世界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中西文字的不同，并非发展速度上的差异，而是发展方向的不同。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关系。与汉语和汉民族思维、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必须具备独立的表意功能。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应该关心和研究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征，建立相应的文字理论，丰富普通语

言学对文字的理解。

再拿语言的类型来说，西方语言学家习惯于用他们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汉语的事实，确认汉语的类型归属。一些学者认为，英语是一种主语占重要地位的语言 (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汉语是一种主题占重要地位的语言 (Topic-prominent Language)。汉语基本的句子结构表现为“主题—述题”的关系。事实上，同印欧系语言相比，汉语的特点并不表现在主题占重要地位，而在于整个句型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都存在名词性句型和动词性句型的质的区别。印欧语的语法可以不区分名句和动句，而以形式为纲主谓二分；汉语语法是一种注重功能和内容的语法，汉语句子类型的划分必须首先把名句和动句区别开来。主题只是名句中的一个句子成分范畴。在汉语中，“主题”和“主语”并不互相排斥。主题联系名句，而大量的动句都是以施事语（即“主语”）为主脑的。汉语的名句和动句都有与印欧语句子殊异的特点。在语言类型学的意义上，汉语整个句型系统的面貌是更深刻、更带根本性的。近年来，国际汉藏语言学界还争论过汉语究竟是 S—V—O（主动宾）型的语言，还是 S—O—V 型的语言。实际上，所谓 S—V—O 或 S—O—V，是印欧系语言典型的以动词为中心挂上主宾的句子模式，拿来作为汉语句子类型的标准并不合适。持论者似乎认定像“我这件事已经办好了”这样的句子是 S—O—V 型，这是用“洋框框”看汉语句子。怎么知道“这件事”是 O 而不是 S 呢？如果说“这件事”看上去像是从动词语“办好了”后面的宾语位置移到动词前的，那么“我这件事没有经验”中的“这件事”又如何“移”呢？古汉语中“闾庐舟车不饰”这样的句子看上去像 S—O—V，但在“昔闾庐食不二味，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左传·哀公元年》）中，与“舟车”位置相同、功能相同的带点的成分又是不是“O”呢？说到底，这一类成分，既不是洋框框里的 O，也不是洋框框里的 S，而是汉语句子特有的成分——句中主题语。它后面的动词不是支配它的，而是评论它的。拿 S—V—O 或 S—O—V 之类西方句子模式来套汉语的事实，结果必然是左套不进，右套不进，以至于一些学者迷惘地认为汉语既有 S—V—O 趋向，又有 S—O—V 趋向，于是竟得出“在类型学上，汉语是一种非始终如一的语言”的结论。这深刻地表明汉语需要建立在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基础上的语言理论。正如陈望道所说：“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

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① 为此，科学地认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就是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区别于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根本特征。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历史，有深厚的语言理论传统。在近代西学如潮水般涌来之时，这一传统出现了断裂。在西方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中国传统的语言理论失去了意义和价值。然而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变迁，人们终于意识到西方语言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汉语的“形”和“神”。而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传统语言理论显示出巨大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它是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生命之源！

杨树达曾从修辞学的角度谈到这一问题。他指出：“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昧者顾取彼族之所为——袭之，彼之所有，则我必具；彼之所缺，则我不能独有。其贬己媚人，不已甚乎！吾今不欲谓吾书足以尽吾国修辞之全，第欲令世之治此学者，知此事为一族文化之彰表，义当沉浸于旧闻而以钩稽之法出之，无为削己足而适人屦，庶足令后生之士有自尊其族姓之心，而他媚之狂或以少戢云尔。”^② 人类语言研究的原始动机，不外乎两种需要：一是典籍阐释的需要，一是交际修辞的需要。典籍阐释使人类不断深化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语言的探究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交际修辞使人类不断调整着人际关系，语言的探究成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典籍阐释还是交际修辞，都出于人类对语言的一种共同的本体论认识。因而中西修辞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共性。如早期的修辞研究都是一种广义的交际、为人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又如早期修辞研究都讲究由对立产生的和谐之美。然而，由于修辞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单纯是一种语辞的修饰技巧，而是语言运用中对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的一种调适，所以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修辞之学闪烁着不同民族的思维智慧之光。

西方的修辞学传统具有浓重的形式化意识，把修辞作为一种“术”，一种外在于言谈内容的包装，由此发展出热衷于繁琐分类的形式主义辞格学派，其研究规范以类型化和技巧性为特色。中国的修辞学传统注重“修辞立其诚”，将修辞与修身养性融为一体，将言辞的修饰归结为身心的诚挚。注意力集中在言语修辞的信实和内在美上，很少关心其外在形式。以意旨的修炼为

①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年版。

②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修辞的理想境界，守约而施博，将修辞活动与整篇作品、整个社会人文环境相互衬映、相互依赖，融为一体。

作为一种注重形式的范式，西方修辞学传统注重知识性、理论性。而作为一种注重内涵的范式，中国修辞学传统更注重经验和体验。

显然，从修辞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语言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决不是西方语言理论所能涵盖和取代的。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把自己的生长点放在对传统语言理论的清理和阐释上，引进、借鉴西方语言理论的新知，积极实现民族理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其二，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与人文科学广泛对话。由于历史的局限，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奉行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的原则，专注于语言结构本身的分析描写，很少关心语言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极大地限制了自己的视域，同时也使自己孤立于人文科学研究之外，自身很少借鉴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而自己的研究成果又令左邻右舍的人文科学感到索然无味。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语言”和范畴也倾向于自然科学化，很少采用，也不会使用当代人文科学所共同使用的语言，不会进行人文科学的理论思维，不会运用人文科学的叙述方式，这对于要在汉语这种人文精神浓郁的语言基础上建立民族语言理论的目标，实在是距离太远了！理论语言学的非人文科学化，也使这门学科在汉语学界日渐萎缩，研究队伍日渐囿于外语学界。这无疑是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进入的一个误区。

为了走出这一误区，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在把立足点转移到汉语研究上之后，将在两个学术层面上积极推进理论语言学的人文科学化：

第一，变革研究语言，转换研究视域，与人文科学研究广泛对话。对话的方式可以分为“学际关系”和“问题中心”两种：所谓“学际关系”的对话是指语言学和各人文学科的相互参照，相互渗透。例如：

语言学和哲学。无论从人文科学的历史，还是从它的研究现状来看，语言与哲学的关系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尽管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以来人们就认识到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在20世纪之前，人们或多或少把语言看作一个无需给予任何特殊注意就能简单地运用的媒介。语言是透明的。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渐渐发现语言不是那种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媒介。语言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是人性和个性的基础。由语言产生的人类抽象思维能力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使我们能够以概念掌握和对付所有那些没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方面，并且因此以我们所使用的方式把我的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样一来，

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了，不再是供人们用来给经验、社会关系、物体命名的简单媒介，而是蕴含着人类对世界的某种基本信念的范畴体系。于是人类思考的重心在历史上由神学世界转移到人类世界，由人类外部世界转移到人类内心世界之后，第一次转移到了人类所使用的符号媒介上。这就是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是由语言与哲学关系的深刻性所决定的人类思想史的必然趋势。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研究，通过其独特的阐释（训诂）框架，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同样应该在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拓宽哲学的视野。西方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思想及其分析方法从语言学发展为一种广泛的哲学与人文科学思潮，促使人文科学研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模式，注重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利用代表现象的符号而不是现象存在的本身。而与此同时，哲学的结构主义又对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作了不同指向的发展：

在结构的超个体、超历史方面，语言学结构主义并不排斥历时语言学，也不否认时间、历史的变化对语言的影响。而哲学结构主义认为有发展规律的历史是虚构的，是历史学家把“自我的总体化的连续性”投射到世界中去。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为历史的“意义”不存在于客观的所指物中，而存在于“可理解性”内。所谓“可理解性”就是将历史看作一连串结构。每一种结构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时间以外的，它们是外在的排列关系而不是必然的历史联系。于是，不是社会先于智力，而是智力先于社会。所有文化都是某种潜在的人类心智结构的产物，最初的社会范畴是逻辑范畴。

在结构的“无事物”性方面，语言学结构主义在否认结构的“事物”性的同时，仍认为结构是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从事物中归纳出来的，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组织形式。虽然用形式化表示结构是研究者的任务，但结构本身对于研究者而言是独立的，对于这种对象性的结构概念，哲学结构主义提出了另一种对象化的结构概念，即认为原则上没有必要把对象看作系统。结构概念只出现在实际决定把一个对象当作系统来思考的时候，只出现在被用于一个系统的，可证实的假设——演绎理论之中。这样的“结构”显然并非对象自身固有的，而是在逻辑演绎中被构成而加以对象化的。这样一来，结构分析上升为一种带有先验论的哲学原则，即社会文化结构虽然要以对象内部实际存在的秩序关系为基础，但它是理想模式予以重组的产物。它不是对象本身的直接反映，而是遵循一种可解释性原则，运用结构模拟的方式，通过对对象进行分割与编配而重新构成的。结构的揭示即结构的重建。

显然，在“结构”问题上语言学与哲学的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语言与民俗。语言是人类最本质的文化特征。语言现象和人类文化现象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因而它自然与人类历史发展中广泛的民俗现象结成了亲密的伴侣。作为各民族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语言无疑是民俗传承的工具；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本身又是一种重要的民俗事象；作为各民族图解世界的一种文化符号，语言的力量更在各种民俗信仰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当民俗的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民俗”（Folklore）这个概念的初始语义正是口传的文学或传统的故事。随着民俗学的发展，语言的调查研究在民俗研究中越来越占有中心的位置。因为一切结构制度、传统、习俗、信仰、态度和手工艺都是以口头示范、字词教导和文字形式传承下来。不仅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谚语、谜语等离不开语言，就是以行为为主导的生产习俗的传授、饮食和服饰的制作、宗教行为的传习等也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民俗的天然载体，其本身又是识别民俗乃至民族特征的基本标志。事实上，许多语言学者同时又是民俗学者、人类学者。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对民俗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方言的地方差异可以显示古语的退化过程。因为标准语的改良总是从文化中心的地方开始，向边远地区波及，越远的地方变化越小。这种方言研究的方法同样可以解释民俗现象的文化现象，形成民俗周围论和文化周围论。又如比较语言学从亲属语言的比较中构拟出原始共同语，这也启发民俗学者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到原始的民俗类型。

所谓“问题中心”的对话，是指理论语言学积极参与人文科学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的讨论，尤其当这些问题涉及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演变的时候。例如语言与人性的问题是当代人文科学的一个前沿课题。对于这个问题，既可以在生物学层面上考察，又可以在社会学层面上考察，还可以在符号学、哲学、心理学的层面上考察。这就需要当代理论语言学者具备人文科学的综合科研能力，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置身局外，碌碌无为。

第二，系统地引进国外语言人文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自然科学倾向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次政治运动、政治批判使理论语言学视人文的研究为畏途，不敢涉及语言的社会文化内涵，对国外的语言人文主义理论也贴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标签而不敢正视与借鉴。这样一来，中国理论语言学者所熟悉的西方语言理论只剩下科学主义一路。这是我国理论语言学的一个极大的误区。事实上，西方语言学史始终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并行不悖的历史，抽掉了人文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本身也就苍白无力。在欧洲思想史上，维柯的语言、

文化“新科学”、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施坦达尔的语言心理主义、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学反逻辑主义、舒哈特的“词与物”范式、克罗齐的美学语言学、浮士勒的语言学唯美主义、魏斯格贝尔的新洪堡特主义，在美洲思想史上有鲍阿斯的人类学调查、萨丕尔的语言模型说、沃尔夫的语言相对性假说等等，还有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将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语言人文主义思想，并把它与中国古代的语言人文主义传统一起纳入人类人文主义语言学的历史长河。从比较来看，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思辨性；美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语言人文主义是同经学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阐释性，这三大语言人文主义传统由于各文化区域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有各自深厚的文化哲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各民族对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具有深刻一致性的丰富思想。尤其是洋溢在这些语言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对民族语言文化精神的热爱、尊重与理解、弘扬，为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其三，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与人类语言理论广泛对话。所谓“对话”，不是学舌，而是理解、交流和互补。对话的前提是对本民族语言的深刻理解。离开了这一前提，不会有成功的对话。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离开了汉语和汉语文传统的文化特征和价值，把中西语文传统置于人类共同发展历史阶段的两个低高不同的时代层次上，认定西方语言理论不仅是最先进的，而且代表了人类语言理论的发展方向。非西方的语文传统只是处在以西方语言学为顶点的发展序列的某一阶段上，必然要向西方语言学所代表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对话”，就只能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既不利于发展本国语言理论，也不利于发展西方语言理论，这实质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话。

以西方语言理论为参照系，不仅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取向，而且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因为西方优越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似乎证明科学是没有文化差异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研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同样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一旦人和自然被共同置于无所不在的科学命题和科学假设之中，形式化的因果换算就被视为唯一的、凝固的真理观。确定性和形式化成为追求的目标，其实质是将研究对象看作人所面对的客体，将人和语言的关系看作视觉模式的一维、平面的对立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忽视了语言的人文性，从根本上忽视了汉语浓郁的人文精神。拿语法理论来说，许多理论研究者以西方语言学形式主义、描写主义为纲，明确提出“必须最大限度地对